

張

載

(西元一〇二〇—一〇七七)

張植珊



宋代諸子的思想，多尊儒家為正統，但又融和了儒、道、佛三家的精髓，蛻變出異於道、佛的理學，開漢代以後思想統一的新時代與新境界。而締造這種局面的雖有前人的默默拓荒，但不可忽視的苦心耕耘者，卻是邵康節、周濂溪、張載、程明道、程伊川等「北宋五子」；其中真正能夠把儒家大道理發揚開來的，應首推張載。

平凡而偉大的生平事蹟

張載字子厚，世居大梁（今山西省天鎮縣東北），寄籍於鳳翔府郿縣的橫渠鎮（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南），後世人尊稱他為橫渠先生。他生於宋真宗天禧四年（西元一〇二〇年），死於宋神宗熙寧十年（西元一〇七七年），論輩份他是二程兄弟的表叔，論年齡他和邵、周都屬同一時期的學人，而且他們五個人又都曾彼此見面談論過學問。

他少年志氣昂揚，才華橫溢，尤其好談用兵道理。在十八歲那年，他書謁范仲淹，暢論世局，並表白抱負，很得到賞識。范仲淹看他是俱有潛力的才俊之士，就指點他多讀中庸一書。受了這番鼓勵

，使他醉心於真理的追求；後來又研究佛老思想，反覆窮求，苦無心得，所以又轉而探討六經要義。這時他已到京師，跟從他的門徒逐漸增多。他坐在虎皮上講學（講易經），傳為佳話，就是後來「皐比」（虎皮）沿用為講座之稱的典故。直到他和二程兄弟（明道、伊川）見面談論起易理的精奧，恍然自感所見之貧乏，即時中輟講學，並且誠懇地告訴學生們說：「我所研究的易經，遠不及程家二兄弟的廣博深入，希望大家多跟他們學去。」這是何等虛心謙讓的襟懷。也正因此，他盡棄異學，潛心於儒家經籍的研修。

為了實踐儒家的理想，他曾在三十七歲那年，考中進士，奉派為雲巖縣令，在任內大大地經營一番，以「敦本善俗」為施政目標，標榜孝悌尊老的精神，致力於倫理崇法社會的實現；為時不久，果然政通人和，謳歌四起。他後來升調為崇文院校書的官，因為當時正是王安石厲行新法，他不願捲入新舊派黨爭的漩渦，於是託病罷官，靜居於終南山麓，鏗而不舍地繼續他思想學問上的鑽研工作。

宋代學者起初研究的經學，偏重於義理修養，故稱「宋學」。但由經學一變而為理學，則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變革。當時理學約分濂、洛、關、閩四派。濂學以周敦頤為代表；洛學屬程氏兄弟；閩學以朱熹為重；關學當推張載。

張載的思想，概括言之，是「以易為宗，以中庸為的，以禮為體，以孔孟為極」。並深信周禮必定可以施行於後世。他常以「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」自任。其思潮澎湃、氣勢高昂，堪稱一代哲人。他的思想散見於東銘、西銘、正蒙及橫渠易說等書中。正蒙的精

華來自易經；西銘的內容，多本於中庸；而以孔孟的仁為主。至於東銘，則是戒戲言戲動與過言過動而作的。

一本萬殊的宇宙論

在「正蒙」一書中，可以窺見他對宇宙現象分析的全貌。他以「太虛」二字代表宇宙的本體，認為太虛本是無形至靜而又和諧的狀態，但有他凝散的動力，就是自然的「大氣」。當他凝聚時，就成了形形色色的萬物，所以萬物只是太虛變化時呈現出的容貌而已。至於萬物分散之後，這些「大氣」像冰溶於水似的，回歸於本體，還原於太虛。憑著氣的規則循環，構成了宇宙的生成和變化。由此看來，太虛是含有永恆的活動性，由陰陽會合沖和而成各種現象。因而又稱之為「太和」。現象雖有不同，來源卻是一致的。他說：「造化所成，無一物相肖者，以是知萬物雖然，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，以是知天地變二端而已。」又說：「兩不立，則一不可見；一不可見，則兩之用息。兩體者虛實也、動靜也、聚散也、清濁也，其究一而已。」由此可知：太虛是「一本」，聚成萬物後成「萬殊」，再回歸於太虛。張載認為宇宙就是這樣「一本萬殊」而生生不息，周而復始的循環變化。

天道性心的人性觀

張載的人性論，也是根據宇宙論而來，他以為太虛既有凝散的動力，它的凝聚使萬物生成，人也

是萬物之一，所以人也是太虛所凝聚而成的。由於太虛有陰陽清濁之分，所凝聚成的人，其氣質性心，也有賢愚善惡的不同。所以他對天、道、性、心四者的解釋，也是不脫其宇宙論的色彩。他說：「由太虛有『天』之名，由氣化有『道』之名，合虛與氣有『性』之名，合性與知覺有『心』之名。」張氏認為宇宙之間，只有太虛循自然方式而運行，所謂天、道、性、心，都是由太虛所繁衍孳生而來的。太虛因有機靈，故能知覺外界，知覺外界又是心的作用。所以心是觸物而生的。張氏對心、性、情三者又作區別，認為所謂心，應指我們精神界全體的總名稱；所謂性，就是指心的本體；所謂情就是心的發動。所以他說：「心，統性情者也。」他又說：「有形則有體，有性則有情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也就是說太虛基於凝聚所成的萬物，屬於純粹至善的狀態，叫做『天地之性』。但太虛凝成的人，因有賢愚善惡不同，故稱『氣質之性』。以上他提出之『天地』『氣質』兩性學說，且把天、道、性、心四者連貫起來，故對學術貢獻甚大。

民胞物與的仁者胸懷

張載在西銘中，對為入之道，說得非常透徹。他以為宇宙萬物都是天地所生；天就是父，地就是母，我們的軀體性能無一不是天父地母所給與的。因此所有人類和每一個小我之間，應該屬同胞兄弟般的關係，就是萬物和每一個小我也是相依為命的。所謂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，應該彼此愛護幫助。大家既是同根而生，理當休戚相關，彼此友愛。至於那些鰥寡孤獨殘廢等的不幸人們，就好比是

我們的哀苦無告的弟兄，應該給予特別關懷照顧。至於富貴榮華的福祉，算是天地賜予我們的優遇；而貧賤憂戚，僅是天地給予我們的考驗。「生」和「死」只是「順境」和「安息」同一回事的兩面而已。他這種民胞物與天人合一的襟懷，畫出了標準人格的典型，簡直把儒家的「仁」光大發揚起來，供後人效法追隨。所以他論為入之道，認為：「心能盡性，人能宏道，性不能檢其心，非道宏人也。」又說：「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然後能無方體；能無方體，然後能無我。」意即為人必須盡性宏道，變化氣質，祛除私慾，始能到達無私忘我的境界。至於為學之道，則強調：「學者當立人之性。仁者人也，當辨其人之所謂人，學者學所以為人。」亦即學貴修身之意。其終極目的在於達到「仁」的境界。

行仁濟世的教育理想

前面說過，張載在論及人性時，最後提起的變化氣質問題，完全根據他宇宙論的一貫思想研究而來。因為人具有氣質之性，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不同，天地之性是和諧的至善的自然性，而氣質之性當中包涵有可善可惡、能善能惡的因素。變化氣質的目的，在於存誠去偽、存善去惡。至於怎樣變化他的昏、濁、劣、惡、趨向於良善純全，那就必須內外兼施：一方面要知禮，一方面要虛心。所以他說：「為學大益，在能變化氣質；不爾，則卒無所發明，不能見聖人之奧。」又說：「居仁由義，自然心和體正，更要約時，但拂去舊日所為，使動作皆中禮，則氣質自然全好。」難怪程伊川讚美他說：「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，使學者先有所據守。」變化氣質僅能說明是張載教育理想中的消極目的。

至於他的積極目標應該在於求仁為主，以達到仁的境界，實踐聖人的道理。他深感秦漢以後學者，最受詬病的，在於「知人而不知天，只求做賢人，而不求做聖人。」所以他總是告誡學生「學必如聖人而已」，「學以修身，所以為仁」。他鼓舞大家朝向做聖人的大道去實踐，把修身為仁作為為學求道的最高目標。

他認為大丈夫要為天地宏揚真理，為人類謀求福祉，為往聖先賢承繼將要中斷學術思想，為爾後代代子孫開啟萬世太平的時代。這是多麼令人崇仰的抱負。從而我們知道張氏的整個思想體系中，充滿了尊天立人、善群濟世的內聖外王的思想。

訓教合一的教育方法

張載主張的教育方法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下列幾點：

一、實踐生活規範：他認為世間事物物都有一定的秩序，維持其週行不息運轉。而禮就是自然的秩序，用以規範人們的生活言行。因為人的氣質有善有惡，必須依賴禮的力量，以便去惡存善。所以他常常告誡學生，日常生活必須合乎禮的要求。他說：「學者捨禮義，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，與下民一致；所事不踰衣食之間、燕游之樂爾。」他認為禮是變化氣質，祛除世俗惡習擾身的最好方法，所以又說：「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，只為學禮，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。」因此學禮成為張氏教育主張的第一要點。其實張載的禮，就是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生活規範，學禮就是要實踐生活規

範。

二、注意常規訓練：他認為良好習慣的養成，要在幼年時期即當開始注意，使不至浸漸敗壞。所以他說：「蒙以養正，使蒙者不失其正，教人者之功也。」就是提示為人師者，務必注意兒童的常規訓練。

三、強調因材施教：他說：「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，知人之美惡。知至學之難易，知德也；知其美惡，知人也。知其人且知德，故能教人使入德，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。」假使教師平時都能注意分析教材的深淺難易；又能洞悉學生個別差異與興趣。就能知道怎樣去從事教學的活動了。

四、抱持懷疑態度：抱持懷疑態度是現代教育學者的主張，也是科學求證的基礎。其實距今九百年前的張載，對此早有論見，他認為存疑是治學的基本態度。有了懷疑，才能促使不斷的思考，能思考自必更有心得。所以他說：「所以觀書者，釋己之疑，明己之未達。每見每知所益，則學進矣。於不疑處有疑，方是進矣。」進而又說：「在可疑而不疑者，不曾學，學則是疑。」真是中肯之言。

五、培養集中注意：張載的清心、主靜，可以說都是主張集中注意的意思，所以他說：「心清時常少，亂時多。其清時，則視明聽聰，四體不待拘束，而自然恭謹，其亂時反是。」他又以為心理清平，毫無掛慮憂忿的時候，就能專心致志，最後達到公平的境界。所謂公平，即是明辨事理是非曲直而不差。也就是頭腦最理智最清醒的時候。

六、主張博文約禮：讀書可以明禮，溫故可以知新，鑑往可以知來，熟習可以生巧；往聖先賢的

言行教訓，正可以啟導學子們的德術兼修。所以他說：「博文約禮，由至著入至簡；溫故知新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。」

承先啟後的民族哲人

綜上所述，張載的學說思想，對後世具有影響價值者頗多。爰舉一二以證之：

第一、他提出「天地」「氣質」兩性之說，並主張用禮去節制氣質的性，使惡的氣質，變為善的氣質。於是調和了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惡，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的綿延光大，接承重要的棒；一方面為人師者提示了教育變化氣質的要途。正如朱熹說過：「氣質之說，極有功於聖門，有補於後學，前此未曾說到。」

第二、他的教育理想在於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。而其為學宗旨，在於「以易為宗，以中庸為的，以禮為體，以孔孟為極」。教授學生，不但以學古力行為主，且「所至搜訪人才，惟恐失其成就」。這完全由於他的民胞物與精神所發揮出的愛心，有以致之。至於他所倡導的教育方法，諸如蒙以養正、清心寡慾、問同答異、學則是疑、溫故知新等，幾與近代教育學說完全相符。

總之，張載悲天憫人的理想，與治學的方法，對宋代學風之樹立產生極大的影響，其成就實已凌駕二程之上，對後世教育尤有啟示作用。